

心阅古城



古城老鼠胡同的塾师和学童雕塑。本报记者 杨淑君 摄

68年前的老照片 牵出古城解放故事

本报记者 杨淑君

翻着一本名叫《老聊城-新聊城》的摄影集,75岁的原古城老居民韩庆云指着一张老照片,向记者讲述起68年前,聊城古城被围困一年,终于解放的历史故事。

老人说,他那时才五六岁,但是挨饿、惧怕炮火、盼望过上好日子的经历让他终生难忘。

这张照片是以光岳楼为背景拍摄的,大路中间向前行走的是精神饱满,扛着步枪或挎着手枪的解放军指战员。韩庆云介绍,1947年元旦早上,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古城,“他们排着队从南门进来后,经过光岳楼转角,往楼东大街面东而行。”

日寇投降后,鲁西各县陆续解放,聊城农村也全部解放了,正在进行土地改革。古城被解放军和抗日民主政府接管,标志着聊城全境解放。

谈及古城解放的过程,老人颇为伤感:“不容易啊,国民党残军王金祥部队困守古城一年,八路军(当时解放军一词还未通用,人们仍习惯称其八路军)围了一年。关在城里的人民缺衣少食,几乎每天都有饿死的。尤其是老年人,病饿交加,在死亡线上呻吟挣扎。”

一年之中,城里往外放过三次人。但是,王金祥部队将百姓当作“人质”,不会全部放出去。如果没有这些百姓在城里,解放军的炮火会加倍地往城里打,将严重缩短王金祥部队的寿命。

解放军战士每天隔着护城河向城头上的国军兵士喊话,大意是:国军兄弟们,快投降吧,你们是兔子尾巴——长不了。共产党优待俘虏,放下武器保证你们安全回家。城头上的兵丁也回话:小八路,快投降吧,国军大部快打过来了,你们迟早要被消灭的。双方喊话越说越难听,然后对骂起来,最后相互打一阵子枪。几乎每天如此。

据聊城党史资料记载,1945年8月16日,日本宣布投降第二天,根据朱德总司令关于收缴敌伪武装的命令,由冀鲁豫七分区副政委张希才任总指挥,以新编二十四团(原马河支队)为主力,与筑先县大队、区队、民兵2000多人围困古城。由于城内匪军力量较强,古城易守难攻,而8月28日国共两党开始重庆谈判,部队在围城十几天后撤离。

此后不久,以二纵为主,配合冀南、冀鲁豫军区部队发起聊博战役。后刘邓大军二纵陈再道司令,宋任穷政委率四、五、六旅以及冀南一分区、冀中军区、冀鲁豫军区的部分部队来到聊城,在四关将敌人包围。

一位革命老人的回忆录讲到:1945年12月31日深夜12点,凛冽的东北风加上鹅毛大雪,千余官兵都翻穿着棉袄,冒着严寒,沿着冰冻的环城湖向城墙靠近。由于人多,冰层裂开,不少战士都掉进了水里。在架登墙的梯子时,梯子的响声被敌人发觉,双方开始射击。敌人占据地位优势,攻城部队没有攻上去,只好撤退休整。

1946年1月12日,四旅在解放博平后,回到聊城协助攻城,战斗一天一夜也未能攻克。正当部队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时,接上级命令,国共两党达成协议,二纵主力撤离聊城,只留下冀南、冀鲁豫军区的部队驻扎城外监视敌人。

1946年6月26日,晋冀鲁豫军区首长命令冀南一分区二十四团,冀鲁豫运东分区六团将聊城围住,待机歼敌。驻防部队在城内挖了宽3米、深3米、长30华里的封锁沟,沟内注入水,还筑起了大大小小的工事,使敌人难以出城抢粮。

12月18日,杨勇司令、张霖之政委率二野七纵来到聊城支援战争。12月22日下午1点,攻城战斗打响。王金祥连向司求救,驻守济南的国民党军队王耀武派其警备旅及110师孙焕彩部驰援聊城。攻城部队赶到在城南迎击济南来敌,其余部队撤离到城东马官屯等待截击。

1946年的最后一天午夜,东城门打开了一条缝,敌人先是探头查看,见无任何动静后便大开城门,拼命向东北方向逃窜,企图取高唐、禹城奔济南。刚到高唐,就被地方部队和追击部队截住,敌人溃败。济南援军在在城南也遭到了攻城部队的有力阻击。至此,古城迎来了解放的春天,人民开始了新的生活。



1947年元旦解放军进入古城,标志着聊城全境解放

本报记者 杨淑君

古代从事私塾教育的教师称为塾师。塾师一般被称为“先生”或“老夫子”。《聊城教育志》主编孙元芳说,人类社会代代离不开教育,因此代代都有名师出现。据《山东各县乡土调查》记录,清末民初的聊城县有私塾250余处,可见私塾教育十分普遍,遍布城乡。塾师也就多达数百名之多,其中教出杰出人才者就成为知名塾师。

东昌塾师那些事儿

古城坐馆老夫子 教授蒙童三百千



设帐:

坐馆维持生计 教授门徒成才

私塾是古代教育儿童的教学场所,私人所办的学校。有塾师自己开办的教馆、学馆、书屋及村校(村塾);有大户人家在家设立、聘请塾师的家塾或家馆;还有属于祠堂、庙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兴办的义塾。

私塾或家馆塾师多是落第秀才或老童生,且多是家境贫寒而又不愿意从事其他职业的“穷秀才”,借教学子养家糊口。塾师一般一人,大的村塾则不定。

塾师自己开办私塾称为“设馆”或“设帐”。孙元芳告诉记者,傅斯年的蒙师孙玉璋,字达臣(亦写为达宸),在古城古棚街路东自己家里办学,教学严谨,诲人不倦。门下多出高才,除了傅斯年这位文化名人外,还有聂湘溪。

聂湘溪13岁应东昌府试,后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。1918年被选为山东省议员,1936年任天津市政府秘书长兼传习所所长,协助张自忠市长处理政务。1941年,拥护筑先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政策,带头交纳公粮,掩护抗日人员,参加抗日活动。

据史书记载,在家教过私塾的还有刘宰金、任圻兴、程时敏、叶光祀、叶锡凤、周汝励等。其中刘宰金,号庚溪,“设教有年,邑中科第多出其门。”任圻兴,字竹溪,“设帐授徒,谆谆恳恳,听夕不倦焉。”

旧时私塾学规极严,多以“学以畏而成”,“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”为信条,对学生滥用体罚,如“打板子”、“罚跪”、“罚站”等。而担任过训导的程时敏,一生与人为善,在设课教学时,因人施教,从不用戒尺体罚学生,备受好评。

应聘:

辅导学诗作赋 教给文章书法

清代叶祺昌,字吟舫,古城朱府街(后改叶家园子街)人。道光二十六年(1846年)副贡,直隶易州州判。既受聘别家,也办过私塾,并著有举业指南类书籍。那时十分重视学诗作对,要教给学生作五言诗和七言诗及律诗、对子等,学有关声韵的知识,使学生懂得平仄。叶祺昌编写的《详批律赋精腋》、《四勿斋训蒙草初集二集》等,都是辅导学诗作赋的。

孙元芳说,光绪年间,马宅街的马殿仁曾被袁宅街朱府聘为塾师,傅斯年在孙玉璋处转学到了朱府后,受教于他。马殿仁对学生循循善诱,对傅斯年厚爱有加,细心辅导,使傅斯年的学业成绩一直保持优秀。

以前私塾通行的教材或称“蒙养教本”主要是“三、百、千、千”,即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家诗》《千字文》,以及《女儿经》《教儿经》《童蒙须知》等,然后进一步学经书、古文。傅斯年得马殿仁严格督导,掌握了全面的古文学知识,也受到了传统伦理教育,为以后成为社会名流打下了较好的素质基础。

后来,观前街的葛小舟、楼南大街的郑锡三也曾先后受聘朱府当塾师。葛小舟,清末秀才,教过的学生中有不少名流,如书法家崔鼓源就是他的学生。郑锡三爱好文学、历史,学识渊博,书法独有风格。他还精于古玩鉴赏,热心于古代文化的收藏。葛小舟、郑锡三特别重视习字课,从对学生扶手润字开始,经过描红、写映本、临帖几个过程,使他们的书法颇具规范。

十县胡同的塾师李守素,多年应聘任教。他喜欢搜集地方掌故,写过《东昌旧话》等手稿,还著过一部笔记小说《聊斋续志》,谈鬼说狐,影射贪官污吏。李守素还是民国年间聊城县孔教会的会长。

名师:

学生千里而来 门下多出名流

孙元芳介绍,那时学生入学不限年龄。自五六岁至二十岁左右都有。私塾中的学生数量,少则一二人,多则可达三四十人甚至更多。据宣统版《聊城县志》记载,朱正谊,字子瑞,古城袁宅街人。从教授徒,常有从外地来读书的学子求教,学子达百人之多。经过他指点的人,无不成名。

私塾里虽然众多学童同窗读书,但是塾师分别教授,且没有教时之分。年幼儿童先识“方块字”(书写在一寸见方纸上的楷书字),后读《三字经》等。教法大多为先教学生熟读背诵,然后在适当的时候由教师逐句讲解(称为开讲)。史书记载,杨光瑜和彭柱韩都是教学特别勤奋的塾师。“杨光瑜,课授生徒,督课最勤,多所成就”。彭柱韩,因为教学得法,生徒中出现了很多名人。

在塾师教学中,学童粗解字义后,则教以作对,进而学诗。“四书”读完后,再教“五经”,兼教《东莱博议》、《古文观止》等古文,并开始教给作文。塾师在“四书”里摘出一句作为命题,教给用论说文的题材写,而且必须按破题、承题、起讲、入手、初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末股等格式去做,时称“八股文”。

历史上的好塾师,都是精通八股文的高手,叶葆即是其一。叶葆,字宝田,号玉岑,乾隆五十四年(1789年)中举人。二十四岁时开始受聘教学,后在本街路南创办“道南家塾”。

据县志等记载,叶葆教过的学生除本地和邻县外,还有江西、河北等外省少年不远千里而来。他教学近四十年,学子180名中,有33人考中举人,7人考中进士,10人选为拔贡,其中有海源阁杨兆煜、杨以增父子,安宅街进士安庆澜,崔家公馆先人崔庄临等名流。

民国年间,羊子巷东段路北有个书法家叫汤子英,他家境贫寒,住着旧屋,平时靠教私塾为生。沿本街东行有个奶奶庙,他把庙屋当教室,教附近的孩子读书。抗战前他曾任省立三师附小高级班教师。闸口东灶王庙院内大殿西侧有两间破屋,住着一位清末秀才王新铭,他设私塾于庙内大殿以东的三间北屋里。教学之余,广搜资料,写了《宣讲室铭》这部供人“宣讲”、劝人为善的著作。



私塾课本《龙光书经》